

中国城市化发展研究的新成果

——评刘传江的《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

杨艳琳

对于正处在社会结构转换和经济体制转轨大变革中的当今中国而言,城市化是一项从理论价值到现实意义都十分巨大的跨世纪的社会经济工程,该课题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力。1999年6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传江博士的《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以下简称《创新》),借鉴与运用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这一重大课题。刘传江博士这部被列入“1996~2000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的23万多字的学术专著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研究的新成果。

《创新》分上下两编共8章来分析与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及其对中国城市化过程和模式的影响问题。《创新》的第一章至第四章为上编,比较系统地描述、分析、总结城市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第五章至第八章为下编,系统地集中地分析、探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安排、变迁和创新及其影响。这种逻辑结构既突出了《创新》的研究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但是,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研究的新成果,《创新》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所运用的方法新。从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问题的文献来看,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思路或对策,是现有这些文献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或者说,在以往的城市化研究中,对于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和形成机制的分析尚不够全面,尤其是对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创新》吸收和运用国外现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曼瑟尔·奥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使用的制度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安排和创新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正如《创新》作者所说,“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的制度分析方法几乎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要研究方法”(《创新》,第3页)。因此,这一具有新意的制度分析方法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城市化发展研究中的不足。因为自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传到我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就越来越多地借鉴、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的有关经济改革与发展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研究我国城市化发展问题,这在理论界还较少;而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和制度安排与创新的视野系统地考察和展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在理论界尚属首次。《创新》在研究我国城市化发展问题时运用的新方法还有比较制度分析法。《创新》作者在主要运用制度分析方法

的同时,还使用了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如根据改革开放前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将中国城市化模式分为自上而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两种模式,并从这两种城市化制度安排的宪法秩序、制度供给主体、制度安排方式、制度安排的动力机制和调控机制、政府在制度安排中的角色和作用、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方式、资金转移和投入方式、城镇形成模式和城镇文明形式等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对自下而上城市化模式中的典型区域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胶东模式、六里坪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比较分析是与制度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可以看作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方法——比较制度分析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理论研究中的成功运用。因此,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既是《创新》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其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理论贡献。”

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所提出的观点新。由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制度的变迁或创新,二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或转变,进一步来看,制度变迁和结构变迁不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两种变迁能同时进行,因此,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变迁,其进程不仅体现为表面的数量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增长动力机制和制度安排上。《创新》不仅试图解决制度安排与变迁及制度绩效量化的问题即城市化进程表面上的数量增长问题,而且试图借助纯粹的西方制度经济学分析来研究东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方面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并试图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和结构变迁这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角度解释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角度展望相关的制度创新。基于这一主题,《创新》的作者提出了以下具有新意的主要观点:第一,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结构转换,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具有显著的制度变迁涵义;第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传统结构的转换与传统制度(或体制)的转轨密切相关,并深受后者的影响,制度安排与变迁在城市化生成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自上而下城市化及其制度安排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第四,自下而上城市化及其制度安排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时期的产物,自下而上城市化制度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格局,同时也大大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五,中国经济仍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与此相应地,分别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导向改革的过渡时期的自上而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两种模式必然会同时并存;第六,如果说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上而下城市化模式中不同城市的投资主体单一,发展方式雷同的话,那么,市场导向改革时期的自下而上城市化模式则是众多各具特色的典型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总称;第七,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是一个从体制外入手,由外围、局部逐步向核心、整体推进的渐进性改革,因此,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制度安排与变迁的路径是:计划经济型一元城市化(自上而下城市化) 转轨经济型二元城市化(自上而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 市场经济型一元城市化。由于已经发生了的有关制度变迁和正在进行着的制度变迁业已改变和正在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与进程,而这种相关制度安排与变迁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城市化模式与进程的独特性,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潜力。

研究城市化发展的理论支点新。如果说作者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研究所得到的的一些结论和观点较之其研究成果有新意的话,那么除了作者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视野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作者首先“发现”一个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全新”的理论支点。这里所说的理论支点是指城市化的生成(及发展)

机制,因为它是研究城市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创新》作者关于城市化生成(及发展)机制(包括产业结构转换是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要素流动与集聚是城市化的实现机制、制度安排与变迁是城市化的推阻机制)的论述是作者自己独到的创见。作者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化生成机制理论,不仅从整体要素分解与相互联系的角度剖析了城市化进程启动与推进的内在机理,而且还在较现有理论更深的层次上解释了“超前城市化”、“同步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这三类发展型城市化模式。其意义不只是限于理论层面,而是同时富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它不仅有助于人们解读我国改革开放前30余年的“滞后城市化”模式和20世纪60年代“极具中国特色”的“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现象,而且能够使接受“三位一体机制论”的人们清楚地找到加快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可行之路。由于制度安排与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创新》作者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制度特征的分析以及对城市化生成机制的独到见解,因而使《创新》成为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新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曾国安)

(上接123页)非,以理服人,既不骂倒一切,也不盲目信奉。该套丛书与国内其他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专著相比,评论部分特别突出,夹叙夹议,重在评论。第三,关于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借鉴、参考和利用问题,坚持取其精华,洋为中用,既反对全盘否定,也反对食洋不化。刘涤源教授认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借鉴和参考西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是必要的,但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可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的东西。我国国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如果生搬硬套,盲目引进,势必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例如,刘涤源教授坚决地批评了我国改革开放中借鉴凯恩斯主义教义的两大失误:一是盲目鼓吹“高消费”,导致严重的奢侈浪费;二是胡乱引进“温和的通货膨胀有益论”,采用通货膨胀政策刺激高速增长,结果几度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阻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该套丛书在理论上的创新,也是刘涤源教授对凯恩斯主义研究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对“凯恩斯革命”内涵的重新阐释。刘涤源教授将凯恩斯革命归结为两大突破: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说史中,凯恩斯是从外因论转到内因论的首创者,即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部去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确认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二是在西方经济学史中,凯恩斯是从自由经营论的旧观念转向政府干预论的新思潮的开创者,促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

第二,对凯恩斯主义历史地位的客观评价,确认凯恩斯主义以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症确认、病因诊断和对症处方,与其他西方经济学新老流派相比,确实具有相对优势,这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病症看得比较准确;(2)它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有缺陷,一为失业,二为收入分配不均,有加以改进的必要;(3)在理论上,它有“有效需求不足”作为病症的焦点,紧紧围绕这个焦点而展开其独特理论体系的构思和塑造。(4)主张政府干预,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弥补私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5)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采取总量分析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第三,确认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虽然西方各国政府没有公开打凯恩斯主义的旗号,但实行的政策显然带有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案的印记。刘涤源教授称之为“隐性凯恩斯主义”。他把1992年美国大选后来克林顿上台执政看成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干预论与自由放任论这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第三个回合,即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的标志。因为克林顿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问题,振兴美国经济为目标,同自由经营论保守经济思潮有着明显的区别。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所采取的经济对策,我们可以看到刘涤源教授的这一判断是深具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

总之,该套丛书的出版是我国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这一现代西方经济学最主要的流派的一次大检阅,把我国凯恩斯主义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在当前面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条件下,该套丛书的出版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曾国安)